

全球智库半月谈

全球各大智库展望 2014 年经济前景

削减 QE 的意外收获：各国汇率向均衡调整

全球收入分配：从柏林墙倒塌到大萧条

美联储退出货币刺激更好的方法：MBS 与国债互换

中国的全球金融野心：小多边框架

安倍首相和奥巴马总统将强化日美同盟关系

本期编译

陈 博

杜元哲

郭子睿

纪 洋

孔莹晖

刘兴坤

刘 洁

李 骁

马文龙

彭成义

靳 航

王雅琦

许平祥

(按姓氏拼音排序)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 国际战略研究组

《全球智库半月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主编的中国社科智讯数据分析报告的组成内容，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和国际战略研究组为您提供。

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

主任	张宇燕		副主任	何帆
首席专家	张斌	开放宏观		
团队成员	刘仕国	欧洲经济	徐奇渊	中国经济
	吴海英	对外贸易	曹永福	美国经济
	冯维江	新兴市场	肖立晟	国际金融
	高凌云	对外贸易	熊爱宗	国际金融
	梁永邦	宏观经济	杨盼盼	国际金融
	匡可可	国际金融	魏强	国际金融
	茅锐	新兴市场	陈博	科研助理
	黄懿杰	科研助理	李想	科研助理
	孔莹晖	科研助理	黄杨荔	科研助理

国际战略研究组

组长	张宇燕		副组长	何帆
召集人	徐进		协调人	彭成义
团队成员	李东燕	全球治理	袁正清	国际组织
	邵峰	国际战略	徐进	国际安全
	薛力	能源安全	欧阳向英	俄罗斯政治
	黄薇	全球治理	冯维江	国际政治经济学
	王鸣鸣	外交决策	高华	北约组织
	卢国学	亚太政治	王雷	东亚安全

彭成义	中外关系	徐秀军	全球治理
田慧芳	气候变化	李 燕	俄罗斯政治
任 琳	全球治理	丁 工	发展中国家政治
赵 洋	科研助理	刘 畅	科研助理
周 乐	科研助理		

联系人: 黄杨荔 邮箱: iwepceem@163.com 电话: (86)10-8519 5775 传真: (86)10-6512 6105

通讯地址: 北京 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1543 邮政编码: 100732

免责声明:

版权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和国际战略研究组所有, 未经版权所有人许可, 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上网和刊登, 如有违反, 版权所有人保留法律追责权利。《全球智库半月谈》所编译的文章, 仅反映原文作者的观点, 不代表编译者、版权所有人或所属机构的观点。

目 录

世界热点

全球各大智库展望 2014 年经济前景	4
----------------------------------	----------

导读：2013 年已经落幕，各大智库和机构开始对 2014 年的经济前景进行展望。来自四家智库的专家对美国、欧洲、中国等主要经济体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WTO 的后巴厘规则：世界贸易谈判议程的变更	7
-------------------------------------	----------

导读：多哈回合贸易谈判停滞不前使得一些经济学家主张废除多哈回合，重启新一轮谈判来解决当前的经济和贸易问题。本文首先回顾了日内瓦贸易谈判以及“巴厘迷你包”提案，然后讨论 WTO 后巴厘时代市场准入方面谈判的必要性。

全球治理

削减 QE 的意外收获：各国汇率向均衡调整	11
------------------------------------	-----------

导读：削减 QE 将抬高基准利率，进而增加无风险收益率。未来较高的收益预期下，全球投资者由“逐利投机”转向“守株待兔”，由“逆长期趋势而动”转为“顺长期趋势而行”。均衡汇率正是汇率市场的长期趋势。因此，QE 削减带来了意外收获，那就是全球汇率更加趋于均衡。本文作者估算了这一效果，并预测了若干国家的均衡汇率。

美元国际地位的最新研究	13
--------------------------	-----------

导读：虽然全球金融危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并且近期美国出现了债务上限事件，但自 2010 年以来，美元的国际地位止住了下降趋势。作者认为，美元国际地位得以保住，是因为缺乏替代者——欧元区问题多多，而人民币国际化程度还很低。

全球收入分配：从柏林墙倒塌到大萧条	16
--------------------------------	-----------

导读：本文计算了从 1988 年到 2008 年全球基尼系数，发现下降了约两个百分点，但经过高收入人群收入调整后下降消失。此外，研究还表明中国是改变全球收入分配的主要力量。

经济政策

总统的冷漠危害 TPP	18
--------------------------	----

导读：美国政府大力推行 TPP 谈判时，遭到了国内奉行贸易保护主义政党的阻挠，奥巴马是迎难而上还是保持沉默，将成为 TPP 能否谈判成功的关键。

LIBOR 丑闻：构想新的参考利率	21
--------------------------------	----

导读：LIBOR（伦敦同业拆借利率）丑闻爆发后，需为金融工具定价及批发零售贷款建立新的参考利率。作者认为，参考利率需满足五个条件：可靠性、稳健性、持续性、有效性及代表性，并在此基础上构想了新的参考利率。

美联储退出货币刺激更好的方法：MBS 与国债互换	24
---------------------------------------	----

导读：根据经济环境需要，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有三种方法：逆回购、特定定期存款和证券互换。作者认为，完全使用国债来替换 MBS，常规化美联储资产负债表是一个更好的方法。因为证券互换不存在风险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的转移，并且国债市场对抵押贷款利率和房价的影响更温和。

聚焦中国

中国的全球金融野心：小多边框架	28
------------------------------	----

导读：在美国经济不再强势以及新兴经济体崛起的时代，中国正逐步加强其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影响力。而加盟包括金砖五国和东盟十加三在内的小多边框架是中国实现其全球金融野心的重要途径。

中国国内投资的溢出效应——基于贸易渠道对撒哈拉非洲国家出口的影响	31
---	----

导读：中国的国内投资对撒哈拉非洲国家的出口具有明显的溢出效应。中国的国内投资增速每增加（降低）1 个百分点，撒哈拉非洲国家的出口增速相应增加（降低）0.6 个百分点。对于石油出口国，这一溢出效应更加明显。

战略观察

华盛顿应如何处理美俄中三国关系 33

导读：自冷战结束以来，中俄关系得到扩展和加深，两国签订了军火协议，增加了经济往来。不过，虽然两国都希望约束美国的力量和西方的影响力，但彼此仍视对方为在中亚地区的竞争对手。这些都为美国在其中纵横捭阖提供了空间。

安倍首相和奥巴马总统将强化日美同盟关系 36

导读：在宣布其“主要枢纽”或“亚洲再平衡”战略时，奥巴马总统将亚洲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首要考虑。日本自然欢迎这一政策。

中国会在南海设立防空识别区吗？ 39

导读：自 2013 年 11 月 23 日中国政府发布划设中国东海防空识别区的声明以来，立刻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各种批评声音也不绝于耳。同时对于下一步中国是否会在周边其它海域也划设类似的防空识别区也引起各方的广泛猜疑。我们到底应该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朝鲜的危险动荡 42

导读：最近张成泽被金正恩判处死刑成为震惊世界的一大政治事件，这表明了金正恩强化个人统治的决心，同时也使朝鲜政局进一步陷入了不稳定之中；张成泽之死，既使朝鲜的改革之路受到影响，也使中朝关系和朝鲜半岛形势变得更加扑朔迷离。金正恩的现行统治方式能否持续下去，又将给该地区带来多大的影响，目前仍不得而知。

本期智库介绍 45

全球各大智库展望 2014 年经济前景

Michael Spence 等/文 陈博/编译

导读：2013 年已经落幕，各大智库和机构开始对 2014 年的经济前景进行展望。来自四家智库的专家对美国、欧洲、中国等主要经济体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编译如下：

Michael Spenc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2014 年全球经济走势很可能会重复后危机时代的模式——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美国经济显著复苏，欧洲缓慢增长。

随着灵活的私人部门将更多的资源转向外部需求为主的可贸易品，美国经济将以 1.5-2% 的实际速度增长。主要的利好因素包括发展中国家的增长（主要是中国），页岩气带来的低价能源，家庭与金融部门的广泛去杠杆化进程。然而，财政支出增速放缓仍然是一个困扰增长的因素，同时公共部门投资不足的现象依然会持续下去，使得长期增长潜力受到制约。

在欧洲，欧央行已经稳定了主权债务市场，但经济增长依然会十分缓慢。大部分南欧地区的名义劳工成本依然高于德国改革后的水平。欧洲要实现统一实际汇率依然前路漫漫。结构性调整和资源转向可贸易品部门的速度依然迟缓，并且会拖累 2014 年的经济增长速度。

中国已经宣布了一项积极而可信的改革计划。如果这一计划得到切实执行，那么，2014 年后的增长模式会变得更加可持续，经济体的收入水平也会不断增长。

其他的新兴经济体，特别是那些经常账户赤字并大量依赖廉价外来资本的国家，在 2013 年受到美国量化宽松退出和全球资本外流的影响，经历了经济动荡。

非洲国家在近十年来表现抢眼。这一势头在 2014 年很可能将延续下去，并且不会过度依赖于自然资源价格和市场状况。这些超新兴市场未来将会是耀眼的明星。

Robert Kah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欧洲的政策制定者目前比较乐观。危机的紧迫感在消退，增长的迹象开始浮现，资本逐步回流。但欧洲远没有跋涉出丛林，而且危机再现的可能性被大多数人低估了。

在连续两年的衰退后，欧元区明年的经济增速有望达到 1%。银行业去杠杆化深入、出口疲弱、宏观经济政策依然趋紧、货币联盟尚未成型等多重因素仍然对复苏形成了强大的压力。需求端需要进一步强化才能推动增长。这么说的话，财政放宽是有利的。欧央行也需要实行更多的政策来刺激借贷，特别是对于外围区的中小企业。全面的量化宽松政策也值得考虑。

但麻烦的是，这样低迷的增长难以有效降低高企的失业率。西班牙的失业率达到 26%，而欧元区整体失业率为 12%，青年失业率也达到了 24%，并且一些国家的青年失业率更是飙升至 35%，对欧洲未来的发展造成了负面影响。

银行业联盟是 2014 年发达经济体政策协调的重点。欧央行的刺激政策处于一艘独木舟上，需要小心平衡。太过软弱的话，欧央行的信用会受到难以弥补的伤害；过于激进的话，又会陷入拔苗助长的困境。

或许，政治阻力是欧洲面临的最大问题。调查显示，财政紧缩使得欧洲居民对形成更为紧密的联盟心生反感。5 月份的连续多场议会选举可能会产生出更加反紧缩的联盟，而且可能会对欧美贸易协议产生阻力。希腊和葡萄牙等外围国家可能会发现，要让民众支持财政整顿会越来越困难。

因此，欧洲面临的核心问题是要在市场对改革进程失去信心之前恢复增长。

Ernesto Talvi, Brookings:

南美洲国家，特别是如巴西和阿根廷那样的大宗商品出口国，与美国经济周期的联动性较小，在过去的十年多时间里，有亮眼的增长表现，使得该区域的经济增速翻倍。这一时期增长的主要推动之一是外国的廉价资本涌入以及高企的大宗商品价格。高增长和再分配措施使得南美洲的贫困率下降了 13%，并催生了新兴的中产阶级。

但自 2011 年中期开始，南美洲的经济增速开始放缓，大宗商品价格下跌。而且随着近期全球金融市场开始趋紧，国际金融和资本资源变得更加昂贵。

这就使得巴西这类依靠外来资本弥补国内资本短缺的国家必须面临结构调整。而那些政策失当较为明显的国家，比如阿根廷和委内瑞拉，已经陷入了危机之中。

对于政策情况尚属乐观的国家来说，最大的挑战在于不利的外部环境和趋紧的金融环境。应对这些挑战的对策往往要面对复杂的政治环境，并且需要长时间才能见效（比如墨西哥的教育改革）。选民们往往会要求政府满足其短期需求，从而放弃长期有利的政策。如何面对这些挑战，对于重振经济至关重要。

Yukong Huang,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中国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一条更加可持续的发展道路。这对于中国的发展至关重要，因为不少同等收入水平的发展中国家，在这个时期都遇到了增速突然下降的情况。这也就是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要解决这些困难，中国必须解决好它的债务问题，并且大幅提升生产力。

2008年中国的4万亿刺激计划使得其总体债务水平增长了接近50%，达到GDP的200%。考虑到中国的高储蓄率和巨量的储备，这一负担仍然是可控的。因此，三中全会的一个目标是强化财政体系，这样地方政府就可以降低依赖银行贷款的同时，以满足他们的基本开支需求。

但更艰难的挑战在于提升生产力。中国过去的高投资率和廉价劳工已经难以维系。所以，中国必须要有更加高效的城镇化进程，使得劳动力从低效的农村和小城市生产活动中被逐步释放出来。同时，允许私营企业进一步发展也很重要。这些企业要比国有企业的效率高上一倍。

当然，尽管高层领导人对这些问题非常关心；然而，普通民众更关注的是社会公平、反腐败和环境问题。所幸的是，三中全会所设计的不少变革也将这些问题纳入了考虑范围。财政改革有助于降低对银行的依赖，提高透明度和加强责任制度。缩减国企规模和简化行政程序有助于遏制寻租行为，鼓励私营企业扩张。灵活高效的城镇化进程也能给中产阶级更多的声音，并且在提高生产力的同时改善环境质量。

本文原题为“Prospects for the Global Economy in 2014”。本文作者为不同智库的专家学者。本文于2013年12月刊于外交关系委员会网站。[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WTO 的后巴厘规则:世界贸易谈判议程的变更

Suparna Karmakar/文 刘兴坤/编译

导读：多哈回合贸易谈判停滞不前使得一些经济学家主张废除多哈回合，重启新一轮谈判来解决当前的经济和贸易问题。本文首先回顾了日内瓦贸易谈判以及“巴厘迷你包”提案，然后讨论 WTO 后巴厘时代市场准入方面谈判的必要性。编译如下：

近期，有关金融和经济增长的负面新闻频繁出现。截至 2013 年中旬，世界贸易总量几近停滞长达 12 个月。更糟糕的是，世界贸易组织（WTO）权威经济学家预测，2013 年世界贸易规模的扩张速度将低于 GDP 的增速，到 2014 年，前者只会略微快于后者，这将彻底颠覆 1980-2011 年间世界贸易增长速度几乎是全球实际 GDP 增速两倍的历史。2008 年金融危机负面影响的蔓延以及由此导致的发达经济体（尤其是欧洲）陷入低迷、大规模新兴经济体增长趋缓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世界贸易的收缩。

在这样的背景下，WTO 的 160 个成员经济体再次希望以所谓的“巴厘迷你包”的有限协议形式获取多哈回合谈判的“早期收获”，从而打破当前的世界经济形势，进而实现世界贸易复苏。WTO 多哈回合谈判进程停滞不前是导致世界范围内区域主义尤其是超区域贸易协定的盛行的主要原因。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威胁到 WTO 框架下多边贸易体系的权威。据 WTO 估算，目前全球跨境贸易的成本约为 2 万亿美元，如果“巴厘迷你包”协议能够达成，边境贸易壁垒的废除以及繁琐的入关手续所产生的费用的削减将会极大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并且随着未来贸易成本的削减，世界贸易不断扩张。

当初，多哈回合启动是为了实现多边贸易自由化，距巴厘会谈（也就是 WTO 第 9 次部长级会议，MC9）为止已持续了 12 年。在过去 10 年期间，现实主义逐渐替代了美好的愿望，因为事实证明在若干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意见，因此如果仅仅是为了恢复人们对 WTO 框架下市场准入谈判技巧及其制定全球贸易新规则能力的信心，达成某些形式的协议也是必要的。WTO 总干事罗伯特·阿泽维多已经意识到，WTO 在其贸易谈判进程中的可靠性取决于创造一种交易，而不是因为解决谈判的“最大的冰山”所剩时间不多而导致的“谈判失败的风险依然存在”。

多哈回合谈判和WTO第9次部长级会议

目前存在的多边贸易谈判回合是2001年11月在多哈举行的WTO第4次部长级会议上启动的官方谈判。多哈回合谈判的期初阶段，多哈部长宣言指定了一系列谈判任务，包括农业和服务贸易、与知识产权有关的贸易以及公共卫生等

方面。多哈回合的工作计划涉及到20个贸易领域。多哈回合谈判也被半官方地认为是多哈发展议程，因为其基本目标之一是促进发展中国家贸易导向型经济的增长。这一特征使WTO框架下的贸易谈判明显区别于最新发起的超区域主义贸易协议谈判，因为后者带有明显的重商主义动机。

2008年7月以来，多哈回合谈判停滞不前。2011年举行的WTO第8次部长级会议曾正式宣布多哈回合谈判陷入僵局。但是，2013年初以来，多哈回合谈判开始有进展。2011年在日内瓦举行的WTO第8次部长级会议上，各成员国贸易部长正式要求世界贸易机构成员要探索新的贸易谈判方式，来打破目前贸易谈判的僵局；由此，成员国求真务实，以免损害到WTO第9次部长级会议的“迷你多哈可交付成果包”。关于“迷你包”的巴厘成果或者多哈回合可以交付的“早期收获”的筹备工作始于2012年12月召开的一次正式的贸易谈判委员会。然而，与经济分析师们所期望的结果相反，WTO成员国一直反复强调，任何早期成果并不是最终结果，而是凝聚所有积极力量以取得多哈回合最终结果的一个里程碑。

WTO第9次部长级会议之前的日内瓦谈判涉及到三个可能达成一致意见的领域，即农业贸易、贸易便利化以及特殊和差别待遇/欠发达国家问题。总体来看，日内瓦谈判的近期工作貌似已经初步勾画出了“巴厘迷你包”可交付成果中关键领域的大体框架，包括这一架构中最敏感的农业贸易问题。但是，要克服无法预料的困难，并最终签订部长级协议仍需要较强的政治意愿以及贸易大国的灵活性，尤其是他们在贸易便利化谈判方面的灵活性。众所周知，背负若干项贸易自由化承诺的WTO第9次部长级会议声明，要想恢复人们对多边贸易谈判机制的信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这正是目前经济低迷和贸易增长趋缓的全球背景下所需要的信心刺激。

WTO的后巴厘规则

多哈回合贸易谈判停滞不前使得人们经常抱怨，这是一个过时的谈判议程，它只能用于解决诸如关税之类的20世纪的贸易问题。一些经济学家主张废除多哈回合，重启新一轮谈判来解决当前的经济和贸易问题。尽管如此，巴厘谈判最终认为，在新一轮谈判开始之前适时终止多哈回合是必要的。尽早终止多哈回合是WTO后巴厘议程中的重要一项内容，由此探索当前谈判进程中的新能量以及成员国之间的合作和妥协机制。2011年多哈回合谈判陷入僵局之后，从广泛的多哈回合议程中筛选出来的“巴厘迷你包”是容易达成一致意见的谈判议程。但是成员国过去几年的经验表明，即使就这一浓缩版的多哈回合议程也会涉及到关键利益相关者之间艰难的选择。在此乐观的一点是：多边贸易谈判还是能够取得一些成果的。

为了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和农业贸易，WTO成员国启动了多哈回合谈判。目前，尽管这些发展中经济体中的多数经济体的总体经济增长速度有所下滑，但是其经济发展状况要好于本次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之后的OECD国家。这些发展中经济体所表现出来的经济增长强劲势头使全球经济力量趋于均衡，并由此改变了人们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前景的预期，尤其是贸易大国，诸如中国、巴西和印度。同时，在当前实施“一国一票”的民主化的WTO谈判机制中，发达国家担心从此会失去以往的影响力，开始倾向于热衷超区域贸易协定。不管我们是否认同美国和欧洲国家贸易谈判的战略重点转向区域和双边贸易协定是否是基于这一逻辑，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多哈回合迟迟不能达成有意义的成果使得主要的贸易大国开始重新配置谈判资源，从而寻求更有意义的双边和区域谈判。

许多国家似乎满足于现状，对于引入全球贸易谈判新规则，规范当前极不稳定性和增长潜力脆弱的全球背景下的多边贸易的愿望并不是特别迫切。后巴厘WTO需要重获其从前的可靠性，因此需要创造一个与时间相关的贸易谈判议程，从而扭转人们目前对多边主义贸易的认识，这又需要尽早地终止多哈回合谈判。但是，迅速实现多哈发展议程所提及的发展议题谈判，从而过渡到一个新的贸易谈判议程，要求成员国不能使当前的谈判程序变得更加复杂。因此，负担过重也许是多哈发展议程谈判停滞不前的原因之一。

导致多哈回合谈判陷入僵局的若干原因中，西方经济学家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关注这一事实，即随着时间的推移，发达国家越来越将多哈发展议程视为另一种重商主义贸易谈判，却忽视了多哈回合发起之初的发展主题。然而，值得考虑的是，如果在农业市场准入和农场补贴谈判方面达成有利于欠发达国家利益的一致意见，那么多哈回合谈判的成果将是最有效率的，因为这将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多哈发展议程中的发展议题。

从这个角度来看，终止多哈回合最简单的方法是成员国从广泛的多哈发展议程中筛选出另一套以发展为核心的可以交付的议程，并且迅速就其进行谈判。这样做的目的非常清晰，就是要减轻WTO成员国的谈判负担，从而启动新一轮的贸易谈判议程。要充分利用当前全球贸易谈判的热情以及倾向于多边贸易谈判而做出妥协的意愿，加快谈判进展是关键。

农业贸易依然是阻碍多哈回合谈判进程的主要绊脚石，也是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之间矛盾冲突的主要焦点之一。巴厘峰会之前的农业贸易谈判在很大程度上还受阻于33发展中国家集团的提议，即为了确保粮食安全和国内粮食救助而进行公共储备。同样，成员国还需要在其他国内规制和做法方面做出一些让步。

然而，要使多哈回合摆脱僵局不能仅仅依靠农业贸易谈判。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来看，还要依赖于工业制成品的贸易自由化，尤其是发达国家长期以来对劳动密集型产品实施贸易保护主义。一些研究者建议通过降低关税来开放其他领域的贸易谈判。但是，特殊和差异化待遇问题依旧悬而未解并阻碍着多哈回合谈判进程。

但是，鉴于过去十年期间工业产品关税谈判的曲折历程，对于主要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最简单的方法似乎是单方面承诺削减工业关税，以换取发达国家对其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进口废除关税和关税升级。当所有国家都摆脱利己主义动机，无条件地单方面实施贸易自由化，那么全球贸易自由化才能够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在新的贸易领域，如果不首先解决多哈回合冲突以及遗留下来的乌拉圭回合纠纷，那么新的谈判的动力将不会自动产生。

此外，后多哈议程不能错误的陷入另一种多哈式的议题繁重模式。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在构建全球贸易约束规则时，新贸易自由主义应充分考虑全球价值链生产和贸易方式的变化，以体现新的商业模式和贸易发展趋势；WTO第9次部长级会议所讨论的贸易便利化协议仅仅是这一要求中的一部分，但却是最重要的一部分。

最后，后多哈新贸易谈判议程要避免将非贸易问题牵扯进来，诸如能源、货币、可持续发展以及环境问题，即使WTO作为理想的全球贸易规制制定机构而拥有较强的魅力。毫无疑问的是，这些议题是全球政府继续加强和实施的领域，但是很难将其纳入主要负责贸易谈判的WTO议程。WTO应该坚持集中于纯粹的贸易和市场准入方面，其他的议题应该由各自负责的全球机构来考虑。

本文原题为“Life after Bali: Renewing the World Trade Negotiating Agenda”。本文作者为Bruegel 玛丽·居里研究所研究员。本文于2013年12月刊于Bruegel网站。[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削减 QE 的意外收获：各国汇率向均衡调整

William R. Cline/文 纪洋/编译

导读：削减 QE 将抬高基准利率，进而增加无风险收益率。未来较高的收益预期下，全球投资者由“逐利投机”转向“守株待兔”，由“逆长期趋势而动”转为“顺长期趋势而行”。均衡汇率正是汇率市场的长期趋势。因此，QE 削减带来了意外收获，那就是全球汇率更加趋于均衡。本文作者估算了这一效果，并预测了若干国家的均衡汇率。编译如下：

均衡汇率是国际经济学中的重要概念。当汇率偏离均衡值时，就被称为汇率低估或汇率高估。例如上个世纪较为常见的汇率操纵，一国货币当局通过买入他国货币，人为压低本国货币的相对价格，进而提高出口竞争力。至今，大部分国家仍或多或少地偏离均衡汇率。

美元作为全球货币，美国货币政策的风吹草动，都会通过美元影响其他货币。近几个月，缩减 QE 的消息屡屡放出，而真正的行动直到 12 月份才见分晓。自伯南克于 5 月 22 日放出消息，至本文 11 月完稿，美联储几番提及缩减计划，却始终按兵不动，搅得市场忐忑不安，各国汇率随之波动。

那么，在这几个月的波动中，其他国家的汇率是更接近均衡值，还是更偏离了呢？

从“逐利投机”到“守株待兔”

缩减 QE 意味着美国基准利率的上调，一旦执行，全球投资者将得到更高的收益。如此丰厚的无风险收益摆在眼前，即便缩减行动悬而未决，投资者的冒险情绪也一落千丈，由“追逐收益”改为“守株待兔”。这对汇率市场影响巨大。

追逐收益时，投资者通过投机行为获取高收益，往往关注短期因素，而不是长期趋势。假设某国货币已经被人为高估，从长期趋势看，贬值是必然的，应做空而非做多；但若仅看短期因素，高估难以在短期逆转，若继续人为干预，该货币甚至可能进一步升值，投资者将选择做多。逆长期趋势而动的交易，只会进一步加剧扭曲，偏离均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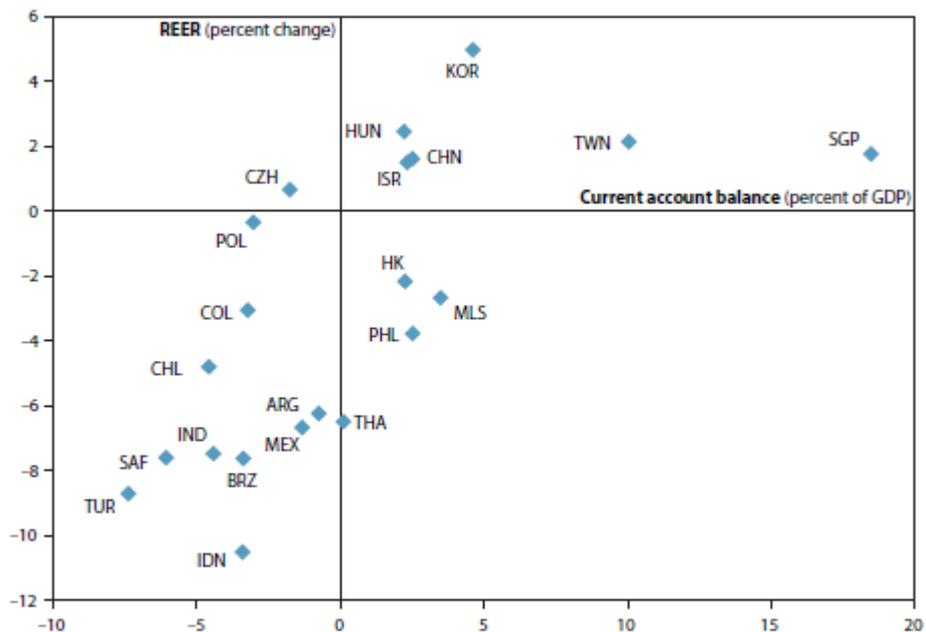
然而，一旦投资情绪转向“守株待兔”，形势将发生逆转。随着缩减 QE 的逼近，投资者确信基准收益率将随之上扬，没必要担着风险，也不再依赖投机行为。他们更加关注长期趋势，而不是短期因素。如果一国货币已被低估，

他们会预期升值，选择做多，反之做空。顺长期趋势而行的交易，将削弱扭曲，趋于均衡。

缩减 QE 助力汇率调整

下图中，横轴是各国汇率偏离程度，亦可理解为“想达到均衡而应做的调整”，纵轴是近几月的汇率调整，亦可理解为“实际的调整”。在缩减 QE 山雨欲来的日子里，各国汇率的实际调整程度，恰好符合了走向均衡的应有趋势。原本低估的几个国家，如中国与新加坡，其汇率升值；原本高估的几个国家，如南非、印度和巴西，其汇率贬值。

Figure 1 Percent change in REER, April–October 2013, and 2013 current account balance (percent of GDP)



REER = real effective exchange rate

SGP = Singapore, HK = Hong Kong, MLS = Malaysia, TWN = Taiwan, CHN = China, CZH = Czech Republic, HUN = Hungary, MEX = Mexico, ISR = Israel, COL = Colombia, KOR = Korea, PHL = Philippines, IDN = Indonesia, THA = Thailand, CHL = Chile, ARG = Argentina, IND = India, POL = Poland, BRZ = Brazil, SAF = South Africa, TUR = Turkey

Source: IMF (2013b); author's calculations.

因此，在过去几个月的 QE 风波中，虽然缩减行动尚未付诸实践，其种种效果却先行一步。其中一项意外收获，就是各国汇率更加趋于均衡。

本文原题为“Estimates of Fundamental Equilibrium Exchange Rates, November 2013”。本文作者 William R. Cline 是彼得森研究所 (PIIE) 的资深研究员。本文于 2013 年 11 月刊于 PIIE 网站。[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美元国际地位的最新研究

Jeffrey Frankel/文 孔莹晖/编译

导读：虽然全球金融危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并且近期美国出现了债务上限事件，但自2010年以来，美元的国际地位止住了下降趋势。作者认为，美元国际地位得以保住，是因为缺乏替代者——欧元区问题多多，而人民币国际化程度还很低。编译如下：

众所周知，1976年以来，美元的国际地位逐渐下降。国际上以美元作为外汇储备，为金融交易计价，进行贸易结算，作为外汇交易载体的程度低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的鼎盛期（1945-1971）。但是，鲜有人注意到最近的数据变化。

要解释美元国际地位逐渐下降并不难：越南战争后，美国的预算赤字、货币扩张和经常账户赤字长期居高不下。

结果，美元相对于其他主要货币和在商品购买力方面很可能失去价值。

- 美国经济产出占全球的比重在下降。
- 今年十月，一些美国国会议员寻求会导致国债违约的策略，引起观察家对美元国际地位的质疑。
- 某些新兴市场货币首次成为国际货币。

一些分析师认为，至2010年代末，人民币将成为与美元竞争首要国际货币的对手。

但是，美元的国际地位并非一直下降。公众最担忧的时期与美元份额下降的时期并不完全一致。以国际上中央银行作为储备货币和外汇市场上作为交易货币来衡量，美元地位下降最显著的时期是1978-1991年和2001-2010年。在第一个时期，日元和德国马克地位上升；在第二个时期，欧元地位上升。

在这两个时期之间的1992-2000年，美元下降趋势出现明显的反转，尽管在90年代中期美元衰落论盛行。1992年，各国央行的外汇储备仅有46%是美元，而在2000年，这一比例上升至70%。

随后，长期下降趋势再现。美元占央行外汇储备比重由2001年的70%下降到2010年的60%。在此十年间，美元在外汇市场的占比也有所下降——其中一方以美元结算的交易占外汇交易的比重由2001年的90%下降到85%。

美元国际地位止住下降趋势

最近的数据显示，美元的国际地位出人意料地止住了下降趋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表明，美元外汇储备占比在 2010 年停止下降，此后一直维持稳定，到目前为止还略有上升。同样地，国际清算银行的报告显示美元在外汇市场的占比由 2010 年的 85% 上升到 2013 年的 87%。考虑到美国财政政策失灵，美元占比能够维持稳定让人吃惊。或许这并不奇怪。毕竟，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时，美国国际投资是净流入而不是净流出。美国国债市场被视为安全港，美元也被视为首要国际货币。

美元缺乏替代者

美元能够保住其国际地位是因为缺乏好的替代者，尤其是欧元区问题多多。欧元占各国央行外汇储备比重由 2009 年的 28% 下降到 2010 年的 26%，继而下降到 2013 年的 24%；外汇交易占比由 2010 年的 39% 下降到 2013 年的 33%。

至于被吹捧的人民币，IMF 的数据显示，以各国央行所持有的外汇储备衡量，人民币还没排进前七位。前六位分别是美元、欧元、日元、英镑、加元和澳元。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显示，在外汇交易的排名中，人民币终于跻身前十位，但其份额仅为 2.2%。

人民币 2.2% 的外汇交易占比远低于中国的国际贸易占比，因此更确切地讲，人民币正成为国际交易中的通货，而不是国际货币，更不用说首要国际货币了。尽管中国政府正积极推进，但人民币国际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某种货币要成为国际货币需要满足三个条件，即经济体的规模要足够大，货币保值，并拥有开放、流动和有深度的金融市场，而人民币只满足前两者。

近期美元国际地位稳定的原因是什么？

最近三年与 1992-2000 年美元地位上升时期，美国的预算赤字都有明显改善。1980 年代破纪录的预算赤字到 1990 年代末变为破纪录的预算盈余。而目前联邦赤字不到 2009 和 2010 年的一半。

或许这只是巧合，对这两组数据做过多的解读是愚蠢的。而更愚蠢的是，只是因为过去四十年来，美国政客没有将美元的霸主地位拱手相让，就相信未来几十年中，他们依然不会。

英镑十九世纪的霸主地位，在二十世纪上半叶被美元取代。美元也未必是永恒的霸主。或许美元地位终将被取代，但还没到时候。

本文原题为“[The latest on the dollar’s international currency status](#)”。Jeffrey Frankel 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经济系教授。本文于 2013 年 12 月 6 日刊于 Vox 网站。[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全球收入分配：从柏林墙倒塌到大萧条

Christoph Lakner 与 Branko Milanovic /文 刘洁/编译

导读：本文计算了从 1988 年到 2008 年全球基尼系数，发现下降了约两个百分点，但经过高收入人群收入调整后下降消失。此外，研究还表明中国是改变全球收入分配的主要力量。编译如下：

本文提供了全球收入分配演变的证据。从东欧和苏联共产主义政权结束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开始是全球化加速的重要时期。在诸多方面，这一时期可能是有史以来全球化水平最高的时期（同时也是对全球化的潜力最为乐观的时期）。研究全球化对世界人口收入水平和收入分配的影响十分重要。我们的研究结果证实了我们早先的发现，即全球不平等水平依然很高，基尼系数达到了 70%。尽管近几年不平等水平出现了下降，但这些变化相对于用来衡量不平等的模糊的标准差来说，似乎并不能充分证明不平等水平的下降。

通过流失收入的稳健性检验发现，“家庭人均国民账户的消费”和“调查的家庭人均收入”之间的正差额，被分配给收入最高的 10% 的人，并且最高收入应遵循帕累托分布，由此估计的全球基尼系数要高出五个百分点。这五个百分点的增长，主要归因于全部差额都分配到了收入最高的 10% 的人，而不是分配给收入分配中最高的帕累托延长的部分。所计算出的数值的 75% 可以被认为是真实基尼系数的上界。

通过把全部差额分配给各国收入最高的 10% 的人口，似乎比目前平均分配差额的做法更加真实。实际上，我们分开讨论的这两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同一个问题。因为在某些情况下，“国民账户消费”和“调查的人均收入”的差额不断扩大，从财政数据得到的结果使我们意识到，该调查低估了最高收入。

本文的研究还得出另一重要结论。如果全部或大部分失踪收入来自于对国家收入分配的最高收入的低估，那么由基尼系数衡量的全球不平等，可能就不会下降。这一重要问题很明显需要更多的研究，但是该问题已经凸显了误报最高收入的全球性影响，而对误报的影响已经有个别国家注意到了。

这里考虑的全球收入分配图形在这 20 年中也有所变化（指基本假设不调整缺失的最高收入）。在 1988 年，全球收入分配呈现一个双峰形，之后就消失了，而这主要是由于中国的高增长。中国最高收入的 10% 填充了 \$PPP2,000 到 \$PPP6,000 这一在 1988 年的图形上相对低洼的部分。这一期间同样见证了所谓

的全球中产阶级的高增长，他们的收入处于人均\$PPP2 每天到人均\$PPP16 每天之间。这一区间的人口比重由 23%上升到 40%。

尤其重要的是匿名和准非匿名增长率在 1988-2008 年的图形。它们都显示出全球收入分配的中部的大部分相对收益是来自于亚洲中上部收入，尤其是来自中国。相比之下，最低真实收入来自于全球百分位的第 80-85 的区域，在这一区域，来自成熟经济体的低收入分位数所占比例被高估了。一个显著的事实是，在 1988 年处于百分位的部分，在 20 年后成为了全球收入分配最平等的部分，其中 90%的人来自亚洲。而 1988 年处于十分位的部分，20 年后成为了全球收入分配最不平等的部分，其中 86%来自成熟经济体。

本文还有一个贡献。它创造了一个新的数据库，（1）几乎全部数据由家庭调查的微观数据组成；（2）使家庭调查这一概念（收入或消费）与一个国家随时间的变化保持一致；（3）仅适用最新的购买力平价交换率；（4）允许在全国十分位数的部分进行平衡面板分析。后者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从未被使用过。换句话说，虽然我们不知道中国的增长率很高，而且这一增长过程有利于富人，但我们不能直接比较中国顶级城市的增长和中国农村的增长，甚至不能和英国、西班牙、肯尼亚的增长相比较。而现在这是可能的，而且我们已经运用了这个数据库所开创的几个方面。事实上，我们发现所有中国人，不管城市还是农村的，在全球收入分配的相对位置都提高了，有时提高很显著，高达 10%以上。中国顶级城市的十分位，从全球百分位的第 68 位上升到了第 83 位。另一方面，几个非洲国家经历了完全相反的演变：他们的全球收入分配水平在下降。在 1988-2008 年间，中国有十次跻身最成功的 20 个国家。而在不成功的国家中，东欧和非洲占了主要份额。

本文原题为“Global income distribution: from the fall of the Berlin Wall to the great”，作者 Christoph Lakner 与 Branko Milanovic 均供职于世界银行研究部。本文于 2013 年 12 月刊于世界银行网站。[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总统的冷漠危害 TPP

Daniel J. Ikenson / 文 郭子睿 / 编译

导读：美国政府大力推行 TPP 谈判时，遭到了国内奉行贸易保护主义政党的阻挠，奥巴马是迎难而上还是保持沉默，将成为 TPP 能否谈判成功的关键。编译如下：

路透本周专栏，外交关系委员会学者爱德华·奥尔登（Edward Alden）高度赞扬了奥巴马政府对贸易与投资自由化议程的支持态度。这让人不禁想起，霍华德·施奈德（Howard Schneider）在去年三月《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报道中指出重大贸易议程的积极意义。当时的预测是到 2013 年 10 月，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谈判（TPP）将会结束，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谈判（TTIP）将会启动，信息技术协议（ITA）的修订也会取得重大进展，多哈回合谈判也会有所推动，这促使我们重新评价美国的贸易政策。

奥尔登和施奈德表示，在奥巴马执政期间，美国政府从一个贸易怀疑论者逐渐转变为积极支持国际贸易政策的执政党。而那时，我警醒大家不要赞扬总统尚未完成的工作，我们应该基于他的行动来评价奥巴马的贸易政策，而非承诺。

九个月后，留给我们的更多是苍白的承诺而非显著的成就。多哈回合只谈成几个小的协议，ITA 的修订失败了，TTIP 离最终达成还尚待时日。但是，TPP 才是美国最重要的贸易政策。加入 TPP 可以主导亚太经济的一体化，美国已为此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努力与信誉。如果 TPP 最终不能达成一个全面综合的协议，会为其经济和外交带来深远的影响。不仅会使已经被丑闻、含糊其辞和虚伪玷污的信誉进一步下滑，而且可能被由中国主导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所取代。

风险高于人们的预期。尽管美国贸易办公室一直在努力推进 TPP 的谈判，但奥巴马一直缺席国内重要且棘手的关于 TPP 的讨论。已经进行了四年的谈判即将宣布结束，但奥巴马还没有从国会那里获得外贸谈判的权利。

国会在宪法上有管制外贸活动的权利，包括贸易协定的谈判。按照惯例，国会通过临时立法把权利委托给协议谈判小组，但临时立法会规定谈判协议的必须项和禁止项。这一过程并非由宪法规定，而是由一群奉行贸易保护主义的共和党人发起的，旨在遏制 TPP 的谈判。

“快速立法”或者“贸易谈判促进权”（TPA）可使谈判更容易管理，但它通常需要向谈判伙伴提供保证：最终的贸易协议不会遭到 535 位会员和议员的反对。美国政府为了取得 TPA 已经尽力减少失误，并不时发表声明国会将对整个过程了如指掌而且将在新的协议中反映国会的意图。但是来自国会大量对 TPA 和 TPP 的反对，又有谁会相信白宫的言论呢？

同时，美国政府声明 TPA 是由国会赋予而非总统的责任，从而避免受到指责。技术上，的确如此，但这需要政府大量的投入和倡导。

大部分国会议员反对贸易协议致使总统的态度也很勉强。至于 TPA，超过四分之三的众议院民主党人士持反对意见。很多白宫的官员也属于贸易保护主义者。奥巴马不愿意挑战这个政党的传统，也不想与国会的民主党人士及其阵营挑起争端。

这种沉默违背了坚强信念和全力以赴的承诺，这刚好解释为什么我们的贸易议程到今天这个地步。也许总统应该想一想，就贸易这个议题，国会民主党人士的观点代表了多少已经注册的民主党人士？这周公布的四年一次的 Pew 研究调查结果显示，83%的已注册民主党人士认为日益增长的贸易和商业关系有利于美国，这一比例要高于国会和共和党人认可这一观点人的比例，分别为 25%和 73%。

但是，现在国内的舆论已经被 TPP 的诽谤者所主导，他们每天的口实已经超出了政府的控制。他们把 TPP 描述成私密的、社团主义的、非民主的、违宪的、保护烟草的甚至对公共健康安全构成威胁的，更有激进的反对者怀疑该协议是为了规避国内的民主化进程。强烈反对 TPP 的人应该和去年坚决阻挠 SOPA 和 PIPA 草案的是同一群人。

第 20 轮的 TPP 谈判将于下周在新加坡举行。但是尽管到了 12 月底的最后期限，他们也不会达成协议。即使各个政党之间关于草案的大部分章节没有太多的分歧，就像报道的那样，最终的协议仍然遥遥无期。为什么？因为无论政府是否获得 TPA，所达成的贸易协议都要经过国会的修订。

奥巴马政府最终没有获得 TPA，这意味着 TPP 要面临全面的修订。一些民主党人士对劳工和环境保护的要求更加苛刻，而由 60 名议员组成的跨党派小组和越来越多的众议院成员坚持 TPP 应该包括解决汇率操纵的条款。还有很多要求难以达成一致。

另外 11 个谈判方非常了解这些动态，因此，只有在国会正式权衡这些要求之后，他们才会提出最后的方案。而这一权衡至少要等到 2014 年——大选之年，因此，TPP 的最后协议最早要到 2015 年才会被国会正式批准。

所以，白宫希望在获得 TPA 之前继续推进 TPP 谈判，从而避免政局动乱。然而这并不能避免，只能被推迟。现在到总统做出决定的时刻了。如果他真想成为贸易自由化的胜者，他就必须承认存在政治权衡，敢于面对自己政党内 TPP 的阻挠者，以及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期待已久的理由——为什么 TPP 对美国的未来这么重要。

如果奥巴马想成功完成 TPP 的谈判，他必须暂时辞退民主党同僚并且和国会共和党人士达成一致，而这两种做法他都没有经验。倘若奥巴马不愿意采取必要的措施来确保 TPP 的成功，当我们等待 2017 年光明前景的时候，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到承诺与行动之间的差距，而那时只有美国在等待。

本文原题为“ The President’s Indifference Imperils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本文作者为 Cato 研究所的主管。本文于 2013 年 12 月刊于《福布斯》。[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LIBOR 丑闻：构想新的参考利率

Vincent Brousseau, Alexandre Chailloux, Alain Durr 文 靳航/编译

导读：LIBOR（伦敦同业拆借利率）丑闻爆发后，需为金融工具定价及批发零售贷款建立新的参考利率。作者认为，参考利率需满足五个条件：可靠性、稳健性、持续性、有效性及代表性，并在此基础上构想了新的参考利率。编译如下：

LIBOR 操纵丑闻浮出水面后，各主要货币基准利率（如英镑、美元、欧元和日元的 LIBOR 利率）的可靠性及信誉受到严重质疑。为使市场对这些重要的参考利率重振信心，金融监管者们展开一系列讨论，试图找到合适的替代品来避免类似的操纵事件再次发生。保守派认为应维持原有货币市场秩序，采取温和的改革方法，而激进派则认为应对参考利率进行彻底洗牌。两派人马展开激烈的争论，由此产生如下几个问题：我们是否需要参考利率？操纵事件为什么会发生，从中我们得到什么启示？短期与长期调整如何进行？

我们是否需要参考利率？

答案是肯定的，有三个原因：

首先，抵押与无抵押两个市场通过对冲交易相互作用，对于双方参与者与央行来说，特定事件的发生时，能够监测到市场条件的改变是相当重要的。这是由于现金及衍生品是通过场外交易（OTC）进行的。一个可靠的参考利率有助于在此类交易中反映市场条件的变化。

其次，尽管各项指标显示银行无担保融资的重要性随着时间变化比较明显，但衍生品市场中，LIBOR 及 EURIBOR 利率（欧洲银行间欧元同业拆借利率）做为基准利率的作用却显著加强。2012 年第二季度，奥地利与比利时批发银行间无担保行为占银行资产负债表比例达到 15%-20%，德国、法国与英国不到 10%。如果将同期的银行间借贷通过担保与无担保衍生品的方式进行加总，这一比例更高，例如法国的银行资产负债表担保与非担保行为占比峰值达到 40%。但问题的关键不是现金，而是金融衍生工具。据国际清算银行测算，十年间，衍生品场外交易的日交易额提升了三倍，2010 年为两万亿美元。于是，依赖于基准利率的金融衍生工具占据了货币市场大量空间，但货币市场的根基却正逐渐被侵蚀。

最后，尽管原生证券市场交易额在下降，但无担保市场中的参考利率仍是金融资产定价的标准。一些国家中，对非金融性企业和房地产的融资随着基准利率（如 LIBOR、EURIBOR）变动而浮动。

操纵发生的原因及给我们的启示

Persaud（2012）认为，此类参考利率操纵事件的发生需要相当多的银行进行协调（或者说共谋）完成。这些银行应有某种共同特征，比如拥有相同的净头寸。

操纵事件的动机至少包括两方面。第一，从交易头寸，包括非现金交易中获取超额利润的动机。第二，出于信誉考虑的非自愿交易的存在。对于后者，金融危机中暗含的市场扭曲加剧了非自愿交易，进而导致了无担保市场活力的降低。

共谋的证据

Brousseau 等人 2009 年的论文为共谋行为提供了证据。图 1 显示，三月期欧元隔夜平均利率指数（Euro OverNight Index Average，EONIA）分布较为分散，但 EURIBOR 利率却分布很集中。实际交易中两种金融工具通过对冲活动，变化应该比较一致，但图中两者呈现明显的分离趋势，这绝不是巧合，说明价格已经不能起到反映市场条件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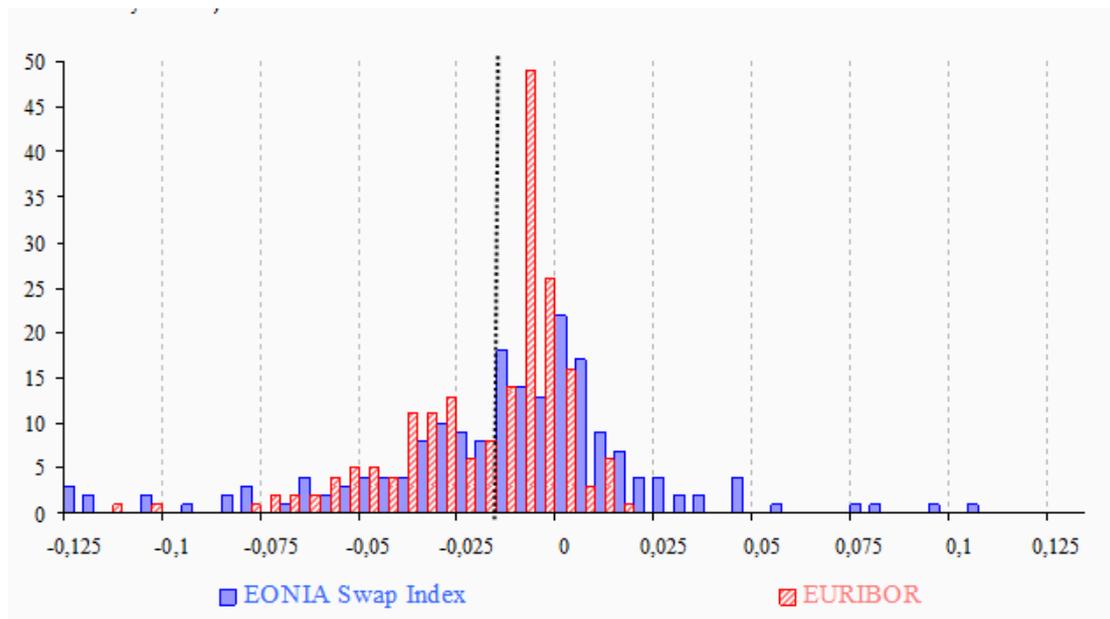


图 1 三月期 EONIA 与 EURIBOR 利率指数（2008 年 10 月-2009 年 7 月）

应如何调整？

始于 2012 年 5 月的调查持续至今，充分印证了我们关于价格操纵存在的判断。如今基准利率对稳定金融衍生品工具定价的作用已成共识，迫在眉睫的任务是恢复货币市场中基准利率的信誉。我们认为需要对基准利率进行重新定义（甚至变更），这样做不仅是因为目前基准利率容易被操纵，还由于金融机构的资金已随时间发生了变化。由此产生两个问题：

- 一、设计 LIBOR/EURIBOR 利率指数的替代品；
- 二、淘汰旧有体系要以谨慎的方式进行，进而避免数万亿的资金暴露于市场风险之中；

一个可行的方法是对现有的 LIBOR/EURIBOR 利率指数进行重新定义，使其成为一个浮动的交易加权指数。这种情况下，价格不仅仅反应某天某一时刻的报价，而且会反应在一个交易序列中资金批发成本。

尽管这个方法有上述优点，但缺点也很明显。这个方法要求市场交易能够持续进行，从而满足参考利率的时间序列连续性。但在有市场分割的前提下，如最近的一次金融危机期间，这个条件显然并不满足。国际清算银行的报告中提到，参考利率需满足五个特点：可靠性、稳健性、持续性、有效性及代表性，这些特点只有在市场拥有充分活力的条件下才能实现。

近期一系列研究报告分析了货币市场和银行融资发展的长期趋势，重点说明了在这种长期趋势下形成可靠的无担保货币市场指数时存在的挑战，上述浮动的交易加权指数受到严重质疑。在这些研究中，提出了若干替代性指标：隔夜指数掉期指数（overnight index swap indices, OIS）和总资金池指数（total cash pool index, TCPI）。

OIS 拥有技术上的优势。它便于核心场外交易工具融资追缴（Margin call）时定价、对冲、报价及计算。

TCPI 有以下几个优点：第一，潜在基础使其无法被操纵；第二、TCPI 的指数化便于银行进行资产负债管理，降低错配风险；第三、TCPI 指数的来源多样性有助于该指数促使各方满足《巴塞尔协议 III》的规定。

结论

LIBOR 丑闻的爆发要求我们在市场活力不足的条件下，寻找新的指标来代替旧有体系。金融危机的爆发使我们认识到 OIS 仍然有效，转向 TCPI 是可能的，但转变不可能一夜之间完成。对新体系的讨论仍应继续，但我们应意识到，新体系成功与否同样取决于其是否适应金融产业的发展。

本文原题为 “The LIBOR scandal: What’s next? A possible way forward”。本文作者为欧洲央行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学家。本文于 2013 年 12 月 9 日刊于 VOX 网站。[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美联储退出货币刺激更好的方法：MBS 与国债互换

Benn Steil/文 许平祥/编译

导读：根据经济环境需要，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有三种方法：逆回购、特定定期存款和证券互换。作者认为，完全使用国债来替换 MBS，常规化美联储资产负债表是一个更好的方法。因为证券互换不存在风险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的转移，并且国债市场对抵押贷款利率和房价的影响更温和。编译如下：

美国联邦储备理事会(美联储)的货币刺激措施有可能存在不良的副作用，需要谨慎地处理：美联储已经积累了巨量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它将在不破坏新生房市复苏的情况下最终得到清算。而这需要完成一个相对简单的创新计划，即美联储把 MBS 转化为等价的国债。当遭受通货膨胀威胁时，这样的计划便于美联储采用提高利率的常规手段来抑制通胀，而无需担忧出售抵押贷款支持证券所带来的经济和政治后果。

问题之所在

为了应对 2008 年金融危机后经济的不断衰退，美联储进行了持续的非常规政策。在过去四年半内，美联储已经向银行体系注入数万亿美元的流动性。这主要是通过购买史无前例的巨额证券而实现的。在该过程中，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从 9000 亿美元激增至 3.1 万亿美元，并预计将进一步扩大，在今年晚些时候达到约 4 万亿美元。

随着经济增长恢复正常，在某一时间点上，最有可能在 2015 年，为防止银行体系中泛滥的流动性演变成通货膨胀，美联储将根据经济环境，开始收紧货币政策。通常情况下，美联储会通过出售其过度庞大资产负债表中的证券，来实现收紧的目的。

然而，在清理巨额 MBS 的过程中——目前总计近 1 万亿美元，并有望在今年年底达到 1.5 万亿美元——美联储将在操作层面面临的巨大挑战在于如何消除其对经济和政治的负面冲击。因为，这样做有可能推高抵押贷款利率，抑制住房和固定资产价格。

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伯南克似乎非常清楚这种风险，他认为当需要收紧货币的时候一旦来临，美联储可能至少一开始，会使用替代的方法来收紧货币——而不涉及证券的出售。然而，这可能不那么有效，并同样存在争议。

资产负债表的常规化

如果在未来一年未清偿 MBS 余额仍基本持平，美联储吞下 1.5 万亿美元总额的证券，将占市场总额的 30%。当感觉该收紧货币政策并希望出售证券时，美联储会发现这并不是他所希望处于的市场水平。因为，这些销售有可能导致 MBS 价格突然大幅下降，这使得银行发放抵押贷款成本变得昂贵，因此会抬高过去四年美联储一直在努力压低的贷款利率。

伯南克一直急于向市场保证，他已经具备收紧货币政策的两个工具。首先是吸引银行将超额货币储备的一部分变成对美联储的定期存款(类似于 CDs)，这将以一个固定的期限锁定了货币。第二种工具是使用“逆回购”，即美联储利用国债作为抵押品不断向银行借钱。

尽管回购有抵押，而定期存款没有，但这两个工具在功能上相同。二者都可以减少银行的可用资金，抑制信贷增长和通货膨胀。但这也隐藏着一个问题：美联储将失去对利率的控制。

如果美联储不愿出售抵押贷款支持证券以收紧其货币政策，而是决心通过定期存款或类似的方法吸收特定数量的银行储备，它将不得不支付市场要求的任何利率。简单地说，美联储必须在管理储备水平和管理利率之间进行选择。它不能同时管理二者。

然而，美联储不太可能允许利率迅速上升到与定期存款的市场拍卖所决定的利率相一致的水平。事实上，自 2010 年以来，欧洲央行(ECB)已经通过限制利率支付进行了许多次这样的拍卖。结果 7 次拍卖都失败了，这意味着欧洲央行尽管公开进行了承诺，也未能使欧元从市场中退出。美联储在关键时刻如果也出现相同的情况，那么也将失去信誉。

因此，传统的美联储货币收紧——从资产负债表中出售证券——是一个更好的方法，至少资产负债表的构成允许其不强制出售不具有流动性和面向特定部门的 MBS。接下来的问题是美联储如何使其资产负债表构成恢复常规化，即在其需要收紧货币政策之前，完全利用国债进行替换。

方法

美联储应该以票面价值将 MBS 组合出售给财政部，以换取等价的新发国债。这些新国债的期限设置可以与美联储的预期 MBS 组合的期限结构相匹配，或允许他们以等同美联储预计收缩其资产负债表的速度滚动(每种方法都有

自己的技术优点)。这种交易对于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的影响是中性的，而只会影响其构成。

财政部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有明确的先例。2008年的住房和经济复苏法案(HERA)给予财政部购买由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地美(Freddie Mac)担保 MBS 的权力。财政部 2008 年 10 月开始购买 MBS，当其持有的票面价值达到 1920 亿美元时，于 2009 年 12 月停止了购买。这些交易导致高风险证券从私人部门转移至公共部门。

然而，在美联储-财政部的证券互换过程中，类似的风险没有从私营部门转移到公共部门，其只不过是证券从政府的一只手到另一只手。政府作为一个整体，其整体金融风险维持不变。

成本收益

然而，有效实施货币政策的好处对政府来说是相当大的。为了收回美元并且抑制信贷增长和通货膨胀，美联储可以出售国债，而无需在市场上出售 MBS。美国国债市场是世界上最发达的、最具流动性的，这意味着如果美联储出售 MBS，市场对抵押贷款利率和房价的影响会比较温和。结果，对于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可能带来的经济负面影响，国会也将减轻其戒备心理。

吸收美联储的 MBS 组合问题重点可能在于国会担心财政风险。当然，由于抵押贷款违约率和其他因素的变化，这些证券的价值可以会上升或者下降。无论是美国政府哪个部门持有，美国纳税人将承担这种风险。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根据美联储最近公布的数据，如果美国财政部从美联储购买这些证券，它将立即获得大约 530 亿美元的未实现收益的投资组合。如果财政部仅仅持有 MBS，直到它们到期，它将使美联储避免遭受损失；如果在某种情况下被迫出售这些证券，利率将上升，因此债券价格将下降。

简而言之，美联储与财政部交换其抵押贷款支持证券，以换取美国国债，对美国纳税人来说更好一些。这保留了证券的价值。更重要的是，对于维持美国经济复苏更有利，因为它提供了美联储从长期非常规货币干预退出的策略，将对抵押贷款和住房市场产生更小的破坏性。

仍然可能提出的问题是，财政部购买美联储 MBS 的组合，将教唆美联储逃避非常规市场干预之后的管理责任。伯南克承认，“使用非传统政策的障碍应该高于传统政策”，因为随之而来的成本，如美联储可能暴露于异常高的金融风险之中。然而，如果这些成本可以之后转移到另一个政府部门，这是他们

可能不能承受的。HERA 为未来危机的干预措施提供了一个模板，阐述了这么一个关注——除了美联储自身证券之外，只能是财政部，而不是美联储进行市场干预。

本文原题为“Exiting from Monetary Stimulus: A Better Plan for the Fed”。本文作者为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国际经济部主任。本文于 2013 年 12 月刊于 CFR 网站。[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中国的全球金融野心：小多边框架

Takashi Terada/文 王雅琦/编译

导读：在美国经济不再强势以及新兴经济体崛起的时代，中国正逐步加强其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影响力。而加盟包括金砖五国和东盟十加三在内的小多边框架是中国实现其全球金融野心的重要途径。编译如下：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一直为减少其对美元的依赖而持续致力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中国的努力或许能促使新国际货币和金融秩序的形成。中国对现存货币和金融规则的挑战的战略出发点是减少其对美元的依赖。最终的目的是国家目标的达成：解决十二亿人口的生计问题以及保持 8% 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速。在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视以美元为国际中心货币的全球现有金融结构为过去时。而全球现有金融机构对达成中国的国家目标是不利的。如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现在进行的改革使得新兴经济体的投票权增加的话，中国将成为紧跟日本之后的第三大出资国。美国仍是唯一的一票否决国：在改革后，美国仍有超过 15% 的投票权（在改革前为 17.41%）。美国国会仍然反对此项改革并且对中国控制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行为表示不满。事实上，只要中国政府仍然有干预外汇市场操作，中国与货币基金组织的现有势力国家（比如美国）之间的矛盾将持续存在。

在要求美元不贬值以及呼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更多考虑新兴经济体发展需求的同时，中国也在减少其对美元的依赖度。比如，在 08 年十二月与韩国签订货币互换协议后，中国的货币互换网络已经覆盖了包括澳大利亚和英国在内的其主要的贸易伙伴国。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这些互换协议不仅仅提供了短期流动性，并且可以让人民币在海外市场以及双边贸易和投资中作为使用货币。中国已经允许与中国签订有外汇互换协议的国家的央行以及有跨境贸易结算业务的海外银行在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投资。另外，由于中国以前的双边互换协议主要是由包括人民币在内的当地货币组成，这些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将有希望增加以当地货币替代美元结算的双边贸易。中国也同意与美国的另一同盟国，日本，合作建立一个人民币和日元的直接交易机制。在此机制下，中国和日本之间的企业间交易可以不用美元结算，从而避免了双重结汇带来的成本增加。减少对美元的依赖是现在许多经济体共同关注的问题，也被视作是美国经济衰落的一个重要证据。而中国也利用此契机，与有着相似看法的国家建立货币同盟。今年十月，印度尼西亚与中国签订了一个规模为一千亿元的货币互换协议。

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增强其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影响力的途径之一是小多边框架：少数有相似想法的国家结成同盟实现共同利益或者建立他们都接受的规则体系。中国至少参与了两个小多边论坛：金砖五国（BRICS）和东盟（East Asian regionalism）。

金砖五国体系由新兴经济体与华盛顿共识中的现有国际体系之间关系演化而来。金砖五国形成主要的战略出发点之一是代表新兴经济体的利益以及通过货币互换协议，建立金砖银行，向包括世行在内的国际组织的高层指派代表在内的一系列战略行为来增强其对全球经济治理的影响力。而这些，都符合中国的利益。

然而，金砖五国并没有在其内部达成任何双边自由贸易协议，也并没有表示出建立贸易集团的意向。这意味着成员国内部缺乏一致性。多哈回合谈判中成员国缺乏一致性被表现地非常明显。然而，在金融领域，金砖五国成员国表现出了更加强的一致性。习近平主席也表明了全球金融体系改革的急切关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必须能够及时全球经济面貌的变化，新兴经济体以及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应该得到上升。”而在今年十月份，他更是提议建立一个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支持东南亚国家及其他亚洲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

在东盟十加三的框架下，东盟十国与中国，日本和韩国加强了已有的金融合作，尤其是清迈倡议多边协议。为了更好的满足区域金融合作的需求，东盟十加三中的国家逐步采用清迈倡议中提到的条款。东盟十加三在加强合作的同时也对美国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带来的新的挑战。

首任东盟十加三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ARMO）主任魏本华先生在 2012 年的就职演讲中表明了上述意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适应一个新兴亚洲经济体要求更多话语权的时代。这是新的全球格局。不管是否满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需要接受这一事实……而相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说，一个区域性机构更能理解其邻国的需求。”中国的崛起意味着又一超级大国的崛起。而中国的全球影响力有其持续的高经济增长作为支撑。而作为中国人民银行的前任高层，魏本华也阐述了这一事实，并强调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地位将受到来自区域金融组织的挑战，特别是有中国作为后盾的东亚。

早在 11 年十月，中国前任总理温家宝就提出了东亚金融一体化可以增强其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影响力的观点：“中国准备与东盟紧密合作，逐渐形成一个稳定而成熟的区域资本市场，提高其对全球金融风险的抵抗力。”为了加强其区域合作组织对大西洋金融危机风险抵抗的能力，东亚达成了以下共识：包括

清迈多边协议在内的金融合作可以作为提高东亚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投票权和资本份额的途径。东盟十加三国家的财政大臣也在 2005 年五月“一起呼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予东亚国家更多地代表名额已反映现有的全球新经济格局。”

然而，我们需要指出，在金融政策和国内治理体系上，中国与现有西方势力国家存在很大的不同。作为减轻对美元依赖的手段之一，中国相关金融机构仍然严格监管人民币汇率。因此，外国企业对是否有动机使用人民币作为贸易和投资的结算货币心存疑虑。而减轻疑虑的途径之一是人民币国际化，允许人民币汇率在国家货币市场上自由浮动。

本文原题为“China’s Global Financial Ambition: Linking Mini-lateral Frameworks” 本文于 2013 年 11 月刊于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研究《东亚区域金融框架治理》报告。作者为 Takashi Terada，同志社大学教授。 [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中国国内投资的溢出效应

——基于贸易渠道对撒哈拉非洲国家出口的影响

Paulo Drummond and Estelle Xue Liu /文 郭子睿/编译

导读：中国的国内投资对撒哈拉非洲国家的出口具有明显的溢出效应。中国的国内投资增速每增加（降低）1个百分点，撒哈拉非洲国家的出口增速相应增加（降低）0.6个百分点。对于石油出口国，这一溢出效应更加明显。编译如下：

中国通过贸易，投资，国际救助以及贷款的形式对撒哈拉非洲国家（SSA）的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在过去的十年里，贸易渠道影响最为显著。到2011年，中国已经成为SSA最大的贸易伙伴，贸易额占撒哈拉非洲国家GDP的16%。中国的快速发展在为SSA经济增长带来机遇的同时，也使他们的经济更依赖中国的发展。

中非贸易的典型化事实

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已经成为SSA的重要经济伙伴。中非友好的外交关系以及国有银行对贸易的支持，大大促进中非双边关系的发展。资源丰富的SSA向中国出口大量的资源，在拉动本国经济增长的同时，也满足了中国投资建设所需要的资源。

无论出口还是进口规模，SSA与中国的贸易额已经超过了与其它国家的贸易额。到2011年，中国已经变成SSA最大的贸易伙伴，贸易额占SSA国家GDP的16%。而且，SSA已经成为中国不可忽略的进口国。同时，SSA与其传统贸易伙伴——经合组织开发援助成员国的贸易额不断下降。

中国与SSA的贸易主要集中在安哥拉，南非，刚果共和国，赤道几内亚，刚果民主共和国五个国家。他们的出口份额占到SSA出口份额的75%。中国从SSA主要进口石油和天然气等能源，SSA从中国主要进口机械，化工产品以及加工制造品。

中国与SSA贸易的经济影响

两地贸易扩张是直接影响。过去十年，SSA很多国家对中国的出口额占GDP的比重持续上升，这一现象源于两方面的发展：第一，从2001至2012年，SSA的国际贸易迅速发展，其贸易额以每年15%的速度增加，对中国的出口占到贸易增速的2.5%。第二，2005年至2012年，SSA对中国的出口增速加

快，大约占到出口增速的 30%。金融危机期间，发达国家外需疲软，来自中国的强劲进口为 SSA 经济注入一针强心剂，缓解了 SSA 经济下滑的风险。

大宗商品的价格效应是中国经济增长影响 SSA 贸易的间接途径。SSA 作为大宗商品的净出口国，其贸易很容易受到国际上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影响。而中国一直是国际上大宗商品的主要需求者。有学者曾计算，2010 年中国消费了世界上 20% 的不可再生能源，23% 的主要农作物和 40% 的基体金属。

中国还通过出口影响 SSA 的经济状况。超过一半的 SSA 每年从中国进口大量的加工制造品。廉价的中国加工制造品在给 SSA 居民带来福利的同时，也给他们的加工制造部门带来激烈的竞争。

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

基于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采用撒哈拉非洲国家 1995——2012 年数据，我们测算了中国国内投资增速对 SSA 出口增速的溢出效应。结果表明：1. 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对 SSA 的出口增速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每增加（降低）1 个百分点，SSA 的出口增速相应增加（降低）0.64 个百分点。2. 这种溢出效应具有稳健性，并不随时间发生太大的变化。3. 当考虑出口平减指数时，上述溢出效应会有所下降，这意味大宗商品的价格效应非常显著。4. 对于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尤其是石油出口国，这种溢出效应更加明显。中国固定资产投资每增加（降低）1 个百分点，撒哈拉非洲资源最为富有五个国家的——安哥拉，南非，刚果共和国，赤道几内亚，刚果民主共和国，出口增速增加（降低）0.8 个百分点。

本文原题为“ Africa’s Rising Exposure to China: How Large Are Spillovers Through Trade? ”。本文作者皆为 IMF 的经济学家。本文刊于 IMF 的官网，为 IMF 的工作论文。
[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华盛顿应如何处理美俄中三国关系

Dean Cheng and Ariel Cohen/文 彭成义/编译

导读：自冷战结束以来，中俄关系得到扩展和加深，两国签订了军火协议，增加了经济往来。不过，虽然两国都希望约束美国的力量和西方的影响力，但彼此仍视对方为在中亚地区的竞争对手。这些都为美国在其中纵横捭阖提供了空间。编译如下：

冷战结束以来的中俄关系

2013年3月上任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首次出访是在前往南非德班出席金砖国家峰会的途中访问俄罗斯。在俄罗斯的一次演讲中，习近平阐述了发展中俄关系的工作重点：开采石油天然气资源；开展军事合作，包括导弹防御；反对干涉他国“内政”等。这与冷战时期大部分时间里的中俄关系大相径庭，那时，全世界最长的边界线上不断发生冲突和对抗。然而，随着冷战结束，中苏关系逐渐得到改善，并向着有利于北京的方向发展。虽然在上世纪90年代中俄都并未积极谋求与美国对抗，但两国都试图推动形成一个能约束美国力量的多极国际环境。9-11之后，中俄对于西方的不安也使他们感觉保障中亚免受美国的影响越发重要。随后，中俄交往激增。从2001年到2012年，中俄领导人每年举行至少一次高层会谈。这些会谈不仅带来一系列中俄联合公报，而且签署了各种工作协议，包括外交、能源、金融、贸易等等。中俄拓展关系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安全问题，这也包含经济因素。

合作的限度

然而，尽管中俄合作在继续甚至扩展，但是这种合作关系的方方面面都有其限度，其根源来自于他们自古以来的相互猜疑。首先，虽然两国经济联系日增，但是双方在对方经济中扮演的角色并不对称。中国对于俄罗斯的重要性远远大于俄罗斯对于中国的重要性。此外，俄中贸易的内容未必符合莫斯科的心意。俄罗斯基础设施或破旧或缺乏也制约了经济交往规模，这也是两国的能源合作进展缓慢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俄罗斯承担不起为满足中国对石油、天然气等原材料的需求而必须进行的升级改造。这种利益的不对称和俄罗斯的相对落后也致使俄罗斯有人担心其远东地区最终会被吸入中国轨道。让人忧虑的不是中国的入侵，而是中国庞大经济和人口的引力会导致当地官方更多地听取北京而非莫斯科的指导。其次，在军售方面，莫斯科对于北京的矛盾心理得到更明显的体现。在过去5年里，中国从俄罗斯的进口量稳步下降，其中从2010年开始中国从俄罗斯的

大宗军备采购开始了两年的间断。这其中的部分原因似乎在于中国的技术水平的提高，而中国对于知识产权的不尊重似乎助推了这一工业水平的提升。与此同时，莫斯科与新德里的交往比它与北京的交往要深得多，而北京对于俄罗斯更乐意向新德里出售更多先进能力和系统感到不满。在政治合作方面，俄罗斯对于中国的戒心在上合组织中有集中的体现。双方不仅视上合组织为合作场所，也视之为竞争的舞台。俄罗斯也在谋求通过利用它与中亚各国长期以来的联系，尤其是情报渗透方面，来抗衡中国的经济优势。

美国的应对之策

美国应当在亚洲保持积极参与的外交、政治和经济势力，并与俄罗斯和中国保持牢固的双边关系，借此利用中俄分歧并确保它们始终是竞争对手。美国尤其应当与中亚国家开展双边安全合作，目的是增强美国 2014 年撤出阿富汗以后的安全环境，防止“基地”组织和塔利班接管喀布尔并向中亚扩展力量。

自尼克松开启对华关系以来，美国从自身利益出发致力于引导地球上面积最大国家和人口最多国家之间的关系，防止它们联手与美国作对。具体来说，奥巴马政府应当：

第一，认识到美国与俄罗斯和中国以及中俄之间共同利益的限度。华盛顿不应想当然地认为这两个国家必然意见一致，应当设法与它们分别打交道。三个国家只在为数不多的情况下有共同利益，比如遏制海盗的劫掠活动。大多数时候必须明白，中俄两国充其量立场一致，但谈不上结盟。因此，无论与它们当中哪个国家合作，美国都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认识到共同利益的限度。尤其是没有什么理由认为中俄两国武装部队正实行联合军事规划。不过，美国应当密切关注它们的互动，以防最终形成这种密切关系。

第二，对北京和莫斯科都推行接触政策。试图孤立其中一个国家的努力实际上会促使它们进一步靠拢。但是，华盛顿不应损害它与自身盟友的安全和经济联系来发展与北京或莫斯科的关系。美国应当设法利用俄罗斯认为中国在远东和中亚是一个长期威胁的忧虑心理。最有利于美国做到这一点的办法是确保让人们知道美国在有可能影响到所有三方的问题——比如 2014 年美国撤军后阿富汗和中亚的安全——上一视同仁地与北京和莫斯科磋商。这一策略也许会让利益的不同和观点的分歧暴露出来。

第三，既在俄中两国也在所有中亚国家推进法治、鼓励透明和善政。最有利于推进法治的办法是倡导公民社会，与所有这些国家的政府和公民社会同行携手

合作。利用社交媒体、公共外交和国际广播等软实力政策工具，美国可以向各种受众传递重要信息，包括他们各自国家的政治状况和对各方相对利益的不同看法。

第四，与中亚国家开展双边和多边合作。美国与中亚国家的合作应当包括与安全有关的工作，比如在北约撤军后扶持阿富汗政府，防止“基地”和塔利班向中亚施展力量。美国应当帮助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武装部队发展制度化能力。此外，美国还可以与日本、韩国和印度一起，帮助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和中亚各国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将北方物资输送网转变成一个区域性贸易网络会有助于许多中亚国家发展经济，减轻对莫斯科和北京的依赖。给予这些国家更多选择将使它们得以在中国和俄罗斯之间走自主之路，也许还会与美国结盟。

本文原题名为“[How Washington Should Manage U.S.–Russia–China Relations](#)”，发表于美国传统基金会网站，作者为传统基金会高级研究员李成与阿里尔·科恩。[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安倍首相和奥巴马总统将强化日美同盟关系

Fumiaki Kubo/文 李骁/编译

导读：在宣布其“主要枢纽”或“亚洲再平衡”战略时，奥巴马总统将亚洲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首要考虑。日本自然欢迎这一政策。编译如下：

美国国防开支的削减，对日本来说是一件具有中长期重要性的事件。如果强制性全面削减开支计划在今年3月1日正式生效，美国政府开支将会在未来十年减少大约1.2万亿美元，其中有一半将会来自于国防开支的削减。也有人认为，即使这一削减付诸实施也没有必要担忧。然而，美国国防部官员承认，如果削减持续下去，他们将缺乏必要的财政手段来支持新的亚洲战略。问题的关键在于，美国能否在军事上采取必要的步骤来应对中国军力的显著增强。

日本需要认识到，财政上对美国国防开支的严格限制有可能持续。无论如何处理“财政悬崖”，其结果仅仅是悬崖与急剧下滑之间的不同。因此，美军正在寻找合乎逻辑的需要，以此来拓展与其亚洲盟友及伙伴的合作关系。问题是日本能否与美国展开充分的合作。

从日本的立场来看，南海和钓鱼岛的问题都面临类似的挑战，即是否容许以既成事实或强制力来改变现状。二战之后确立的全球秩序基础表明，这样的改变是不允许的，不满和争议必须通过外交谈判和平解决。

自前国务卿克林顿在2010年7月的东盟地区论坛会议上发表讲话以来，以上原则同样是美国明确坚持的。和平解决争端的主张受到了广泛欢迎，而且只要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提出其主张时能够接受这一观点，它就有望得到广泛的支持。尽管这一观点为美国、澳大利亚、菲律宾等国接受，但它不一定被欧洲接受。甚至美国记者一次又一次地误解了钓鱼岛争端的形势，结果他们毫不怀疑地接受了中国政府的官方解释。这就需要在欧洲、亚洲以及美国开展更多的公关活动（它迫使公关预算增加）。日本政府偶尔也致力于通过谈判解决北方四岛和竹岛问题，从这一意义上说，日本在领土问题中的交易已经很有借鉴意义了。

在对华问题上，奥巴马政府起初采取一种磋商谈判的缓和政策，但最终它变得比它的前任们更加强硬。其转折点就是上文提到的克林顿国务卿的讲话。我们不确定新国务卿克里如何对待中国，他可能倾向于谈判或是过于重视中东。朝鲜可以通过核试验向克里国务卿发出第一个挑战，但在长期的对华问题中将检验其

是否具有足够现实主义的世界观。某种意义上来说，奥巴马总统可能不得不跟他坐下来谈一谈，以确认他们在重大的外交政策问题上持有相同的观点。

二战结束以来，日本第一次面临在领土问题上与外国发生武装冲突的危险（竹岛和北方四岛，分别处于韩国和俄罗斯的管控之下，自从日本承诺通过谈判而不是武力来解决这些争端之后，在这些问题上就一直没有出现擦枪走火的危险）。安倍政府必须对其对华政策小心谨慎。增强安全以及改变现行政策的决定性努力，对于直接保卫钓鱼岛和应对中国军力的快速提升，毫无疑问都是必要的。在日本国内外寻找对这些措施的广泛支持和理解可能并不困难。建立日本海岸警卫队、增加防务开支、支持日本的安全委员会、完善保密法律、修改政府对集体自卫权的解释等，都是应当追求的，同时也是增进与美国联系的有效途径。

从中长期观点来看，这些措施中给人印象尤为深刻的是修改内阁法制局对集体自卫权的解释，这将极大地拓展日本在安全问题上有意支持美国的范围。日本应当意识到，事实雄辩地证明，日本已成为美国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盟友。通过为美国提供驻日军事基地的关键性重要权利，不仅保卫日本，也保卫“远东的和平与稳定”，日本成为美国亚洲军事部署的柱石。如果日本通过采取上述措施，包括修改集体自卫权的解释等来弥补当前同盟中的弱点，它将增强其作为美国盟友的价值。

日本可以和美国一起做的，还有大大小小的其他一些事情。正如一位美国外交政策专家认为的那样，通过交换在日本船只上部署美国公务人员的专业知识，日美两国海岸警卫队可以有更加紧密的合作。¹ 通过决定现在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日本能够向前迈出一大步。战后以来日本的成功主要是经济的成功，而不是军事的成功，这尤其要归功于制成品贸易。某种程度上时代已经变了，但日本未来的成功仍然取决于通过贸易与投资来投身于外部世界。通过参加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日本能够有助于亚太地区新兴经济秩序的形成，并且能够支持安全、政治、经济、文化和价值观方面的多层同盟关系。

与此同时，在日本寻求向世界传达的信息中，如果首相在“慰安妇”和其他历史问题上表现轻率，安倍政府将会制造增加困惑与干扰的风险。向世界准确传达日本在“慰安妇”问题上的立场不是不可能，但这是一个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繁重工程。的确，这一主题应当至少部分被纳入历史学家间的共同研究，以及其他类似的努力。通过坚持和平解决、法制原则、适用于东海和南海的航行

¹ <http://www.tokyofoundation.org/en/articles/2013/extended-deterrence-and-security-in-east-asia>.

自由，安倍先生就能够占领道德高地。他的成功至少部分地取决于其能否明确地建立起外交政策议程中的优先顺序。

本文原题为“Prime Minister Abe and President Obama Can Strengthen the Alliance”。本文作者久保文明 (Fumiaki Kubo) 为东京大学教授和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 (JIIA) 客座研究员，本文于 2013 年 2 月 19 日刊于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网站。[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中国会在南海设立防空识别区吗？

Richard A. Bitzinger/文 马文龙/编译

导读：自 2013 年 11 月 23 日中国政府发布划设中国东海防空识别区的声明以来，立刻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各种批评声音也不绝于耳。同时对于下一步中国是否会在周边其它海域也划设类似的防空识别区也引起各方的广泛猜疑。我们到底应该怎么看这个问题呢？现编译如下：

简介

中国在东海设立防空识别区被批评为是在破坏地区现稳定状，威胁航行自由的危险举措。而中国政府没能加强控防空识别区的有效管控只能进一步凸显其弱点；另一方面，使用军事力量对其进行管控也可能引发一场危机冲突。

评论

中国在东海建立防空识别区很快被证明是一个失误的决策。一方面，它成为中国的一场外交灾难；另一方面，它可能引发危险的军事危机——北京应负全责——或者只是一个虚张声势的举措，这进一步凸显了中国作为一个地区性大国的软弱。

防空识别区不涉及领土主权要求

防空识别区不涉及领土要求，这一点至关重要。设立防空识别区旨在对拟进入一国空域的异国航国器提供早期通知、定位和管制。防空识别区并不是一个新鲜事物，超过 20 个国家设立起了防空识别区。美国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就设立了第一个这样的区域，9·11 恐怖袭击之后，又在华盛顿特区设立了一个特殊的防空识别区。日本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就设立了一个包括钓鱼岛周边在内的防空识别区。此外，大多数防空识别区只是某国单方面宣布的，其设立虽无国际法依据，但通常得到其他国家的认可。

但是，中国的防空识别区似乎是为引起地区冲突而故意设立的。首先，它与三个亚洲邻国所设立的类似的防空识别区有所重叠，同时还包括了有争议的钓鱼岛。同样备受争议的是，中国要求所有进入防空识别区域的民用飞机都要通报，即使他们只是通过这一防空识别区而无意进入中国领空，然而其他防空识别区域没有类似的要求。最后，中国要求所有非商业航班（尤其是军用飞机）进入防空识别区域必须事先作出通报，否则中国军队将采取“防御性紧急措施”。

鉴于这些情况，设立这一防空识别区饱受谴责就不足为奇了。日本和韩国立刻发表申明谴责这一新举措。东京发表申明称“完全不能接受”中国设立的防空识别区，而韩国国防部也宣布在其自己的防空识别区内的航班，将不会通知中国。

美国谴责说新防空识别区的设立造成中国东海地区的不稳定同时也侵犯了国际航行自由权。美国国务卿克里宣称“航行自由以及其它国际合法使用海域和空域的权利是太平洋地区繁荣、稳定和安全的必要条件。我们反对任何国家对无意进入其领空的异国飞机执行防空识别区程序规定。”

中国会在南海设立防空识别区吗？

总体而言，中国努力通过东海防空识别区的设立来加强其在该地区的权利要求的做法可能是事与愿违的，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会相当尴尬。美国为了表示拒绝接受中国防空识别区的态度，在没有预先通知中国的情况下于 2013 年 11 月 26 日派出两架未挂弹的 B-52 轰炸机进入中国东海防空识别区。中方没有任何回应。这件事传递的信息是，中国可能不愿或没有能力通过军事手段加强其对防空识别区的管制。此外，中国的行动可能招致邻国在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问题上的联合反对。例如，首尔和北京在中国设立防空识别区的问题上处于不同的立场，中韩友好关系可能遭受冲击。

中国东海防空识别区的设立可能对亚太地区，尤其是在东南亚地区产生更广泛的影响。近几年来南海地区紧张局势持续升温，北京最近的努力——包括提供数十亿美元的新商业交易投资来平息对中国在该地区日益上升的影响力的担忧，都可能因积极的执行新的防空识别区而功亏一篑。

这些努力看起来更缺乏说服力，因为中国已经宣布可能会在未来进一步设立新的防空识别区，这就使得中国在南海设立防空识别区具有极大的可能性。

美国是主要的受益者

美国可能是一系列新态势的受益者。华盛顿的“再平衡”重返亚洲政策自三年前颁布以来面临诸多困难。中国在该地区日益增长的进取姿态——甚至表面上看是这样——可以极大地帮助华盛顿恢复核心地位，并带来新的区域合作伙伴参与到这一过程中来。

因此，总的来说，到目前为止中国在东海设立新的防空识别区的努力是得不偿失的。而且，如果中国决定强制执行在这一区域的管理政策，可能会带来更糟糕的结果。在“受到西方侮辱的官方叙事”的推动下，中国外交政策越来越多的受到“民粹民族主义”的影响(引用英国广播公司(BBC)最近的一份报告)。

这种“受害者”意识可能会使中国政府在周边海域的领土主权要求的问题上变得越来越强硬，甚至包括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最终，不仅是对中国，而且对整个亚太地区来说更糟糕的情况是，中国可能使用武力来推行其政策。

本文原题为“China’s ADIZ:South China Sea Next?”。本文作者理查德 A·比青格（Richard A. Bitzinger）为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关系学院（The S. Rajaratnam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RSIS）高级研究员，本文于 2013 年 12 月 2 日发表于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网站。[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朝鲜的危险动荡

Doug Bandow/文 杜哲元/编译

导读：最近张成泽被金正恩判处死刑成为震惊世界的一大政治事件，这表明了金正恩强化个人统治的决心，同时也使朝鲜政局进一步陷入了不稳定之中；张成泽之死，既使朝鲜的改革之路受到影响，也使中朝关系和朝鲜半岛形势变得更加扑朔迷离。金正恩的现行统治方式能否持续下去，又将给该地区带来多大的影响，目前仍不得而知。现编译如下：

朝鲜领袖金正日已经去世两年了，但他的儿子金正恩已经采取了一种比以往所能预测的更血腥的方式加强控制——对他的姑父“摄政王”张成泽判处死刑。然而，没有人知道这个体制是否稳定。

金正恩的上升从来都不是确定的。当他父亲金正日去世时他还不到三十岁。金正恩没有时间去确保权柄。金正日是在 2008 年 8 月明显的中风恢复后才开始移交权力的。相反，金正日的父亲，朝鲜的“永恒”领袖金日成花了 20 多年的时间才把金正日推到最高领导人的位置。

况且，金日成和金正日都和不同的女人生有不少孩子，他们中的一些人也宣称拥有“王朝”的继承权。金正日把权力从朝鲜劳动党转移到军队，动摇了他父亲的控制系统，因此平壤还有很多人等待着获得最高统治地位的机会。

金正恩所谓的辅助者们——张成泽，其姑姑金敬姬，以及总参谋长李英浩——对巩固其统治没有明显的兴趣。他们身居要职，权势倾天，并且他们可能都有自己的政治野心。张成泽必定明白当头号人物的价值：在金正日生病时他成为其替身，并且在此之前他曾受到金正日的清洗和平反。

在最近的两年中，包括军队在内的数百名官员都被撤职了。在这期间最具戏剧性的是对李英浩的撤职。2012 年 7 月，他突然被宣称因健康原因而离职，同时，一则未经可靠证实的报道披露了他的保镖和试图逮捕他的军队之间发生了交火，这很有可能导致了他的受伤或死亡。朝鲜劳动党宣称对军队的控制权，但目前还不清楚这项决定是由金正恩做出的，还是由诸如其竞争对手张成泽做出的。

朝鲜的外交政策将更加防范西方。该国已经建立了外交冒险政策和对抗的名声，新政府加强了这一举措。同样重要的是，无论是在经济还是在政治领域，朝鲜现在都没有改革的迹象。虽然有些人在谈论经济自由化，但实践中并没有突破性的改变。金正恩在统治上比其父亲更加具有压迫性，据传统基金会

的布努斯·克林纳观察：前者“增加了公开处决，扩大了关押政治犯的集中营，并加强了对所抓住的从外界获取信息的任何一个人的惩罚力度。”

现在轮到张成泽出事了，西方没有必要为他的死叹惜。在朝鲜，政治总是一个高危行业，张成泽已经在顶层享受了长久的安逸生活。此前，他的家人只是消失，官方从来没有宣称对他们处以死刑。所以大家不禁要问：张成泽的戏剧性垮台对于朝鲜的稳定或政策是否意味着什么？当然，就目前而言，还尚不知晓。

张成泽的死表明金正恩正在巩固自己的统治，去掉另一个由他父亲指定的看守者似乎能使他的统治更加稳定。而且，金正恩动用死刑的决心至少会让那些最想挑战最高权威的人打消念头。韩国仁济大学钦熙桂指出：“通过展示一场血雨腥风的一点点，金正恩的个人权力会得到进一步巩固。”

然而，朝鲜将会陷入进一步的不稳定之中。这个事件是史无前例且震惊世界的，鉴于以往的经验，这表明“天堂”已经出现问题了。

平壤政治的不稳定局势恐怕将减少最小可能的国内改革和外交活动。如果金正恩确实是想强化个人权力，他现在会感到更加自由地去行动。但是，精心安排一个更大范围的清洗需要时间和努力。如果他仍担心那些继续反对其统治的集团，尤其是当他们在对最高权力构成潜在威胁的军队利益上发生冲突时，他很有可能会推迟实施任何引起争议的政策。

此外，张成泽还与经济改革和中国有关。他参与了经济管理并被认为支持自由化政策，至少更加注重经济发展。

中朝双边关系长期以来一直都很紧张。朝鲜需要北京，但又总是试图使其周边的大国关系得到平衡。确实，朝鲜表现的好像中国别无选择，只能支持朝鲜。目前，虽然中国向朝鲜发出了越来越多的刺激性信号，但对张成泽的判决还是确定下来了。不论张成泽的死刑背后是怎样一个真相，中国与平壤之间的谈判将会变得更加困难。

更加危险的是，与他的父亲和祖父相比，金正恩的残暴统治会受到更少的国际约束。金日成的代价是为此挑起和输掉了一场大战，金正日实行了一项永久的挑衅政策，但知道何时停止。如果年轻的金正恩想要建立一个全面的个人独裁统治，他很有可能会错误地把国内的强权统治变为一种国家实力，而这将是该地区每一个人的灾难。

朝鲜长期是一个令国际社会没有办法的地方，而且这一地区的地缘政治问题也仍然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即使是张成泽的死刑也不会改变什么，这个事件提醒我们，朝鲜在东北亚仍然是一个充满威胁和神秘的存在，而正在进行的领导层的过渡——不论是金正恩权力的强化还是权力分配问题的悬而未决都不可能给该地区带来和平和稳定。

本文原题为“North Korea’s Dangerous Shakeup”。本文作者 Doug Bandow 是 Cato Institute 的高级研究员，也是美国前总统里根的专业助理，他是《绊网：变化世界中的朝鲜半岛和美国外交政策》的作者，同时他还是《朝鲜半岛的难题：美国与朝鲜及韩国的麻烦关系》的合著者(Palgrave/Macmillan)。该文 2013 年 12 月 17 日刊载于“国家利益”（在线）。[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本期智库介绍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CFR) 外交关系协会

简介：成立于 1921 年，是美国非政府性的研究机构，致力于对国际事务和美国外交政策的研究。CFR 是一个由精英学者组成的组织，成立伊始就成为 20 世纪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智囊机构，曾为威尔逊总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出谋划策。该协会主办的《外交事务》杂志曾刊登过乔治·凯南、基辛格和斯坦利·霍夫曼等美国知名外交家、国际政治学者的论文。在《2011 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CFR 在全球（含美国）150 大智库中列第 6 名，全球 80 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 24 名，全球 50 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 7 名。

网址：<http://www.cfr.org/>

Brussels European and Global Economic Laboratory (Bruegel) 布鲁塞尔欧洲与全球经济实验室

简介：布鲁塞尔欧洲与全球经济实验室成立于 2005 年，是主要研究国际经济的独立、非理论（non-doctrinal）的智库。致力于通过开放、基于事实并且与政策有关的研究、分析和讨论，对欧洲及全球经济政策制定作出贡献。bruegel 的成员包括欧盟各国政府以及一些领先的国际公司。在《2012 年全球智库年度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2）中，bruegel 在全球（含美国）150 大智库中列第 8 名，全球 80 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 6 名，全球 50 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 1 名。

网址：<http://www.bruegel.org/>

Peter G.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PIIE)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简介：由伯格斯坦（C. Fred Bergsten）成立于 1981 年，是非牟利、无党派在美国的智库。2006 年，为了纪念其共同创始人彼得·乔治·彼得森（Peter G. Peterson），更名为“彼得·乔治·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在《2012 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2）中，PIIE 在全球（含美国）150 大智库中列第 15 名，全球 80 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 5 名，全球 50 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 3 名。

网址：<http://www.iie.com/>

Cato Institute 加图研究所

简介：加图研究所位于华盛顿特区，成立于 1977 年，是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大型智库之一。加图研究所以古典自由主义传统为思想根基，致力于“扩展公共政策辩论维度”，通过独立、超越党派的公共政策研究和讨论，旨在“恢复小政府、个人自由、自由市场以及和平的美国传统”。加图研究所的政策分析曾经影响过里根政府和布什政府的政策。在《2012 年全球智库年度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2）中，加图研究所在全球（含美国）150 大智库中列第 19 名，全球 80 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 2 名，全球 50 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 17 名。

网址：<http://www.cato.org/>

The Center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CEPR) 经济政策研究中心

简介：经济政策研究中心成立于1983年。它包括七百多位研究人员，分布于28个国家的237家机构中（主要是欧洲高校）。其特点是提供政策相关的学术研究、并关注欧洲。Voxeu.org是CEPR的门户网站，受众为政府部门的经济学家、国际组织等。它的文章多为与政策相关的工作论文初稿，比财经报纸专栏更为深入，同时比专业学术文章更加易懂。在《2012年全球智库年度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2）中，CEPR在全球（含美国）150大智库中列第27名，全球80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18名。

网址：<http://www.voxeu.org/>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简介：IMF于1945年12月27日成立，为世界两大金融机构之一，职责是监察货币汇率和各国贸易情况、提供技术和资金协助，确保全球金融制度运作正常，其总部设在华盛顿。IMF主要通过监督、贷款以及技术援助和培训三大职能来促成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IMF的工作论文及其他出版物在全球宏观经济政策研究方面拥有巨大影响。

网址：<http://www.imf.org/>

The World Bank (WBG) 世界银行

简介：世界银行（WBG）是世界银行集团的简称，“世界银行”这个名称一直是用于指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BRD）和国际开发协会（IDA）。这些机构联合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低息贷款、无息信贷和赠款。它是一个国际组织，其一开始的使命是帮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破坏的国家的重建。今天它的任务是资助国家克服穷困，各机构在减轻贫困和提高生活水平的使命中发挥独特的作用。

网址：<http://www.worldbank.org/>